

2021

## On Wang Yuanhua's Ideas of Jingju and His Reflection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ei Li

leeway1975@qq.com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 and the [Cultural History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Li, Wei (2021) "On Wang Yuanhua's Ideas of Jingju and His Reflection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Vol. 41 : No. 2 , Article 3.

Available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1/iss2/3>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s.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s.

# 中国京剧选本:以文本为中心的京剧研究

李东东

---

**摘要:** 中国京剧选本忠实记录着京剧史的演进轨迹,1880年以来,京剧选本迅速发展并承载了数量丰硕的剧目文献。因此,以中国京剧选本作为文本中心的京剧研究得以成立,并且能够弥补现今学界偏重表演研究一端的不足。具体而言:梳理选本文献的基本形态及其历史演进规律,可以概览文本中心的中国京剧选本发展全貌;把握脚本实录的文本中心及其文学性,有助于开辟京剧表演研究之外的文本文学研究新领域;选本理论、京剧理论、经典化理论,共同构成了中国京剧选本文本中心理论研究的三个重要方向。

**关键词:** 京剧选本; 文本中心; 文学; 理论

**作者简介:** 李东东,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师资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戏曲史与戏曲批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通讯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100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0234。电子邮箱:ldd90@shnu.edu.cn。本文为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戏曲史(上海卷)”[项目编号:19ZD04]、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暨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中国京剧选本研究”[项目编号:20FYB037]、2020年上海市社科规划青年项目“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上海京剧剧本编年叙录与研究”[项目编号:2020EWY001]阶段性成果。

---

**Title:** Chinese Peking Opera Anthology: A Text-Centered Study of Peking Opera

**Abstract:** Since 1880, Peking opera (*jingju*) anthologie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and collected a large number of plays. Therefore, the text-centered study of *jingju* based on anthologies has been established, which could fulfil the gap in existing *jingju* studies that focus on performance. Specifically, by outlining the basic forms and evolutionary rules of the selected texts, we can survey the full picture of text-centered anthologies in development. By foregrounding text-centeredness and literariness of playscripts, we can open up a new field of textual studies beyond the studies of performance. The major aspects of theoretical studies of *jingju* anthologies include theories of anthology, theories of *jingju*, and theories of canonization.

**Keywords:** Peking Opera anthologies; text-centeredness; literature; theory

**Author:** Li Dongdong, Ph. D., i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His areas of academic specialty include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eatre, and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Address: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100 Guilin Road, Xuhui District, Shanghai 200234, China. Email: ldd90@shnu.edu.cn This article is funded by the Major Projec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und for Art (19ZD04), National Post-funded Projec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FYB037), and the Youth Project of Shanghai Social Sciences Fund (2020EWY001).

---

作为中华民族的艺术精粹,京剧不仅舞台演出繁盛,同时还有选本文献随之勃然兴起。自光绪六年(1880年)《梨园集成》刊行以来,京剧选本产生至今140年之中,各类选本文献纷然面世,

其中现有500余种存世。<sup>①</sup>单就数量来看,京剧选本早已远超元明清三代以戏文、杂剧、传奇为主体的戏曲选本总和。然而,对于以昆腔传奇等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戏曲艺术而言,学界对其剧本研究

的关注力度相对大于对场上演出的关注力度;对于京剧等近代崛起的花部地方戏而言,研究格局则恰恰相反。通常认为,中国京剧作为国粹艺术代表之一,最为引人注目之处在于舞台表演,而非文学文本。“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几乎所有涉足京剧研究的人,都或多或少地承认,京剧表演艺术属于上乘,戏剧文学性不敢恭维。因此我们看到,通行的大量的所谓京剧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名角逸事、剧坛掌故、演出史料等等层面。”(袁国兴 5) 从而造成“面对京剧,研究者只看重表演,避而不谈文学”(颜全毅 3) 的极端学术格局。由此可见,以中国京剧选本作为文本中心的研究格局则是现有京剧研究的缺憾与不足,有鉴于此,我们将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作为文本中心的中国京剧选本研究。

### 一

中国京剧选本文献的重要价值不言而喻,但是长期以来由于“贵古贱今”“重雅轻俗”等文献辑录观念的影响,清代以来京剧选本散佚流失严重。现今学界虽然指出京剧剧本文献极为重要,但却囿于种种原因未能对其进行整理研究。<sup>②</sup>因此,要对京剧选本进行研究,首先需要明确它的基本文献形态与历史演进脉络。

单就中国古代戏曲选本发展历程来看,清代乾隆时期至宣统三年是戏曲选本的转型时期,“主要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文人文化层的退场、昆腔选本的衰变和花部诸腔选本的崛起”(朱崇志 23)。一般认为,“京剧孕育形成于 1790 年(清乾隆五十五年)左右—1880 年(光绪六年)左右”(《中国京剧史·上册》8),我们认为这一时期同样属于京剧选本的发生阶段。发生阶段的京剧选本皆以剧选为主,光绪六年(1880 年)安徽竹友斋刊本《梨园集成》集中体现了花雅之争以后发生阶段京剧选本的典型文本形态。《梨园集成》收剧 48 种——皮黄 45 种,昆曲 3 种;不仅代表了清代后期花兴雅衰的戏曲生态格局,而且证明了西皮二黄融合嬗变的历史发展轨迹。发生阶段的京剧选本同时处于中国古代戏曲选本转型阶段:一方面留有古代戏曲选本的刊刻印记,另一方面又在编者身份与编选体例方面出现新变。《梨园集成》虽然仍是传统坊刻选本,但其编者李世

忠先是太平军降将,后为戏班老板,典型地反映出花部戏曲选本与文人文化层整体疏离的状态。同时,《梨园集成》还首创“遵班雅曲”、断代选刊的编选体例。发生阶段的京剧选本文献形态还应包括以《皮黄曲本四十八种》等为代表的钞本与合缀本《醉白集》。1919 年经由苕溪灌花叟裱订的《醉白集》现存 44 册,收剧 137 种,是为同治年间至民国初期以刻本、抄本、石印本等合缀而成的“百衲选本”,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发生阶段京剧选本的文献形态。

1881 年至 1914 年,中国京剧选本开始迅速发展。从光绪年间上海文宣书局《绘图三庆班三套京调脚本》48 册至 1914 年上海改良小说书局《中华共和梨园界京戏脚本》12 册,此一阶段的京剧选本最为显著的特征便是名以“绘图京都××班京调脚本”系列的石印本。其中三庆班系列最具盛名,约有 20 种。这批选本标题强调名班脚本,多数选本在每剧前附插图,同时标明“京都头等/壹等名角××(名伶)曲本/脚本”,可见从《梨园集成》接续而来,以戏班为中心的京剧选本编选样态更加鲜明地体现在选本题名之中;而其每剧之前“名角曲本”的冠名,显示出京剧演出史上戏班中心向名伶中心过渡的变动轨迹。需要指出的是,这批选本虽然多数冠名“京都”,但是出版地域集中在上海,仅有个别选本出自北京。该阶段的京剧选本同时包括《攀香山房抄戏词》与《消闲录》等为代表的抄本系列,它们仍以剧选为主,但是抄本之中开始出现脚色唱词底本为主的词选现象。

1915 年至 1951 年,京剧选本的出版发行渐成鼎盛大观之势,综合呈现两种文献形态。其一是以上海各大书局出版发行的“戏考·大观”系列为中心。尽管早在 1912 年 8 月 10 日,上海申报馆就已辑录出版《戏考》(《顾曲指南》)第一册,但是完整出版《戏考》40 册的工作却是此后经由上海中华图书馆排印完成的。从《戏考》开始,京剧选本出现新变:首先,抄本系统基本消失。其次,京剧选本的印刷出版紧随物质技术革新,由刊刻到石印而又迅速转向排印,选本插图也从绘图转向照片。再次,京剧选本出现剧前述考内容,同时呈现分册发行、系列出版、不断再版的繁荣现象。最后,《戏考》先后发行 40 册,收剧 530 种,是中国京剧选本史上首个具有“求全”意识的选本,

成为鼎盛时期后续京剧选本争相模仿与试图超越的对象,其后不断出现各类以“戏考”命名的选本系列。“戏考”之外,鼎盛时期的上海大东、泰东、世界、文明、大美、大文等多个书局先后推出“大观”命名的京剧选本系列。既有剧选,又有词选,同时出现依据名伶唱片整理标注中西曲谱的京剧教学选本,对于探寻京剧音乐板式与名家唱腔的流变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大观”系列选本更多地强调“名伶秘本”,反映出鼎盛阶段名角中心的舞台现象。其二是以北京打磨厂中心的“堂印本”系列为代表。北京打磨厂中心的京剧选本集中经由泰山堂、致文堂、老二酉堂及杨梅竹斜街中华印刷局等排印出版,多以单册发行,每册收剧数量三五种不等,剧选为主,少数兼收词选。打磨厂中心系列选本最早出于清末,但是集中出版并且形成气候却在民国初期。还需特别关注的是:一、鼎盛时期除却北京、上海两个出版重镇之外,伪满洲国时期安东地区的京剧选本出版也较兴盛。二、京剧选本出版虽以北京、上海作为中心,但是发行传播遍布全国,乃至影响海外。三、京剧选本与商业广告开始紧密结合。四、我们称其为鼎盛时期,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京剧选本不仅数量丰硕,而且版本类型基本完备,这一时期是整个中国京剧选本史的典型代表阶段。

1951年至1963年,中国京剧选本进入承前启后阶段。承前体现在对鼎盛时期“戏考·大观”系列选本的延续出版与对传统剧目的整理结集方面,启后体现在演员个人演出剧本选集的涌现出版方面。1951年5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京剧选本的编辑出版由此出现转变。首先,1953年至1954年,上海部分书局沿袭“戏考·大观”系列选本的出版方式遭到了严厉批评,<sup>③</sup>并且迅速成为时代绝响。其次,为了配合“戏改”工作,中国京剧选本开始出现官方组织整理结集出版的行为。1953年至1959年,中国戏曲研究院率先编辑出版《京剧丛刊》(1—50集),据《中国京剧史》等所载,《京剧丛刊》是五十年代进行的“戏改”工作的具体成果,其中所收的全部剧本都经过整理加工,并且有的作了比较重要的改动。需要指出的是,尽管1950年代“戏改”风行,但是京剧选本“校勘底本、原本刊出”的工作并未间断;1957年至1964年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编辑出版的《京剧汇

编》(1—106集)“是京剧艺术遗产的忠实记录,也是它与《京剧丛刊》中所收剧目的不同之处”(《中国京剧史·下册》101)。最后,从1954年《梅兰芳演出剧本选集》开始,京剧演员个人演出剧本选集的出版酝酿生成,这既是对此前名伶中心的集中反映,又是对此后流派中心的鲜明预示。

1964年3月,北京举行部分地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由此至1979年,中国京剧选本进入“革命现代戏”选本的集中出版阶段。1964年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并非只是会演,而且随即迅速出版《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唱腔选集》三集。该著的出版标志着中国京剧选本发展出现重大转折,“革命现代戏”成为此后十五年间京剧选本唯一公开发行的内容题材,先后出版相关选本十余种。更为突出的是,这批选本集中出版主要唱腔、唱段选集,目的是“供给广大京剧音乐爱好者、音乐工作者学习、交流和研究的参考”(中国戏曲研究院1)。较为特殊的是,这批京剧“革命现代戏”选本还应包括1967年上海文化出版社的《毛主席语录京剧唱腔专辑》,它的出版标明了京剧作为当时重要的宣传工具之一,能够及时有效地传达时代政治理念。与“革命现代戏”选本的公开出版相对,这一时期京剧传统剧目选本只能“内部发行”。1973年5月,《京剧流派唱腔简介资料唱词选》选本出现,按照行当分为四册:老生部分;旦角部分;花脸部分;老旦·武生·小生部分。这批选本所收皆为当时每一行当著名演员流派代表剧目,用于“内部参考”学习。颇具意味的是,这批选本仅有印行年月,不见出版机构,每册封面标明“内部参考阅毕收回”。我们认为,《京剧流派唱腔简介资料唱词选》的出现,证明了即便在“革命现代戏”最为强劲的时期,传统流派剧目仍然作为可供参考学习的“内部资料”哺育供养着“革命现代戏”的发展。这种现象,不仅说明了京剧传统剧目的无限魅力,而且反映出中国京剧选本发展历史的内在逻辑链条从未间断。

1979年,《京剧传统唱腔选集》出版,中国京剧选本自此走向回归与复兴阶段。所谓回归,是指中国京剧选本重新开始公开出版传统剧目选本;所谓复兴,是指中国京剧选本综括此前所有出版类型与内容,同时衍出新生。回归与复兴阶段

的中国京剧选本集中呈现出以下特点:一、除却专门强调“传统”或“现代”之外,其余选本基本二者兼收。二、演员演出剧本选集繁荣发展,并且由此带兴演员唱腔/琴谱选集、流派唱段/剧目选集出版。三、各级戏曲院校不断出版具有教学、演出价值的京剧选本。四、1981年开始,剧作家选本出现:田汉、华粹深、马少波、翁偶虹等剧作家选本不断行世。剧作家选本的繁荣与演员演出剧本选集一起构成京剧选本史上“案头”与“场上”两个中心并驾齐驱的局面。五、民国时期的部分京剧选本得到整理与再版,以《戏考》的影印再版与《戏典》的整理出版最具代表。除这些共同特点之外,还有几种特殊选本需要强调:一、1992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徐世英编著的《京剧唱词选注》,首次对京剧唱词中的典故与疑难进行详细注解,将京剧唱词与古典诗词同等对待,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京剧唱词的文学性。二、2005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李瑞环改编剧本集》,表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京剧剧本修订整理工作的身体力行与带头作用、对京剧事业当代繁荣发展的积极扶持与大力倡导。三、“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工程”丛书对部分京剧剧目进行英译出版。这套丛书所选京剧剧目虽然是以单本印行,但从丛书选本工程着眼,其对京剧选本的海外传播意义重大,并且代表民族优秀文化遗产“走出去”的积极尝试与推进。

总的来看,中国京剧选本的发生是在中国古代戏曲选本进入转型阶段之后开始的,它与中国京剧史的发展轨迹基本吻合但又呈现出相对“延迟”的特点。这种“延迟”恰好证明京剧选本的出现是对京剧历史阶段特征的忠实记录与伴随反映,同时补充呈现京剧历史发展阶段的史学面貌。中国京剧选本的历史演进与近代以来出版印刷技术的不断革新密切相关,因此文献形态方面呈现出更新迅速的特点;同时,选本内容辑录标准紧随京剧舞台发展走向——先以剧选、词选为主,后有谱选、腔选进入。出版地域方面,中国京剧选本一直以北京、上海为出版重镇,而以安东(伪满时期)、台湾、香港等为代表的其他地区的出版现象也颇值得关注。与此同时,日本、新加坡等国关于京剧选本的藏录、京剧剧目的介绍翻译等,也为中国京剧选本的域外传播与影响研究提供了材料,值得不断发掘。

## 二

中国京剧选本的文献发展历程既已明确,那么以其作为文本中心的京剧研究将要如何展开?众所周知“研究戏剧,大致分两条路:一条路是研究戏剧的文学(就是剧本),一条路是研究剧场的舞台的种种设备和种种艺术。”(陈大悲 8)那么,京剧作为戏剧艺术,真的可能完全脱离文本文学而只谈舞台表演吗?在承认京剧存在“述演”的“非文本中心”的前提下,伴随京剧表演共同生长的京剧选本能否形成京剧研究的文本中心?既然存有数量丰硕的京剧选本保存剧目文本文献,那么这些剧目文本是否有其独特的文学性?或者说有哪些要素可能构成京剧文本中心的文学性?这些问题的提出与探讨,将对我们进入京剧选本的内部研究大有裨益。

依据现有史料文献,京剧选本文献的出现晚于京剧舞台表演。整体而言,京剧选本文献是对当时或者此前京剧舞台表演剧目的忠实记录与综合反映。因而,从《梨园集成》开始,中国京剧选本即有一条贯穿始终的选辑标准理念——脚本实录。“脚本是排演时用的剧本,有手钞的,也有刷印的。”(48)《梨园集成》的封面强调“遵班雅曲”,也即说明所选剧目皆遵当时戏班演出实况;此后三庆班、义顺和班等署名选本皆以“脚本”标注命名;抄本系统更有显而易见的脚色唱词底本特征。清末民国时期,“名伶脚本”几乎为所有京剧选本的标题冠名;直至当下,各类京剧名家演出脚本仍是层出不穷。因此,脚本既是中国京剧选本文献的核心理念与主要内容,又是舞台表演的文字凝结与文本实录。与此同时,由于京剧多是形制短小的折子戏本,基本难以独立刊印出版,所以数种折子连篇出现也就自然组成选本形态。如此一来,脚本实录也就成为中国京剧文本中心的核心理念,而文本中心的汇聚集中体现也即京剧选本。

既然中国京剧选本是脚本实录的文本中心的集中体现,那么对其进行研究也就构成了京剧选本文学研究的可能。陈大悲在探索戏剧研究的两条路时,最后指出“爱美的戏剧研究,必要两路并进才可以”(8)。其实不仅“爱美的戏剧研究”,任何形式的戏剧艺术都是“必要两路并进才可以”。

现今学界对于京剧研究偏重舞台表演一端的格局,并非证明京剧艺术缺乏文本文学而只有舞台艺术。与此相反,这种现象的形成恰恰说明学界对于京剧剧本文学的固有成见与长期轻视,以及对于京剧选本作为文本中心综合呈现的忽视与遗忘。其实,徐凌霄关于“声术化的社会文学”“戏台上的立体文学”(徐凌霄 6)的讨论,钱穆“唱的文学”“存神过化”(钱穆 171)的观念,颜全毅“紧紧把握京剧文学作为舞台文本,为表演中心服务的特征”(颜全毅 19)的论述,皆从表演文学的角度对京剧文学进行不断探索。然而,我们仍须指出,这些探索虽然皆从文学视角立论,但是无一例外地强调京剧文学属于“表演文学”。如果撇开表演文学层面,单从文本文学层面切入,中国京剧选本之中数以千计的剧目文本,是否有其独特的“案头文学”价值?

在进入中国京剧选本文本文学价值的探讨之前,我们需先明白为什么现有的学术研究对于京剧文学的探讨总是止于表演文学层面:

我此次来讲京剧,想仍从文学观点为出发。我认为文学应分为两种,一是唱的说的文学,一是写的文学。由唱的说的写下或演出,则成为戏剧与小说,由写的则是诗词和文章。在中国,写的文学流行在社会之上层,而说的唱的则普遍流传于全社会。近人写文学史,多注重了写的,忽略了唱的与说的,这中也有理由,我不能在此细讲。此所讲的,则是唱的文学中之京剧,至少也涵有甚深文学之情味。(钱穆 172—173)

钱穆此论指出传统文学观念对于戏曲小说的遮蔽与偏见。其将中国文学分作两端:作为“唱的说的”一端的戏曲小说经由“写下或演出”两种方式进行传播,其中“演出”方面成为京剧表演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写下”方面的京剧选本往往遭到忽略。既然京剧存在“写下”方面的丰富选本文献,并且这些选本文献是京剧表演文学或者“述演”研究作为核心案例与主要内容不断引用分析的文本依据,那么为何它们仅能代表京剧存在表演文学的可能,而无法成为京剧拥有自我文本文学价值的体现呢?这种现象着实令人费

解。其实,任何研究京剧表演文学或者“述演”中心的著作,在源源不断地使用京剧选本所收的剧目文本作为“演的”文学层面分析之时,都在不断证明这些剧目文本本身确实存在文本文学价值,否则这些文献引用或者案例分析就会完全失去逻辑依据与研究价值。

既然学界已经逐渐承认京剧存有文学价值,却又为何有保留、有限制地将其囿于“表演文学”一隅?其实这与京剧选本自身有关。《梨园集成·自序》阐述选刊过程自言“频约善才,删除贻本”以证明选本制作精良;但是从实际来看,其中漏讹衍倒之处不胜枚举,错字俗字更是俯拾皆是,其后清末民初的京剧选本几乎皆有此病。毋庸讳言,这些现象的存在确实有碍京剧选本的文本文学价值,加之部分唱词过于直白,甚至粗浅不通,从而导致对于京剧文学性的相关研究一直显得小心翼翼而不够自信。而在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京剧选本开始注意并且逐渐摆脱此类问题。《京剧丛刊》《京剧汇编》皆是依据不同原则对于所收剧目进行整理校勘,《京剧唱词选注》则是依据诗文注解体例进行编刊,更有《李瑞环改编剧本集》等既从宏观主题结构,又从微观唱词念白等多个方面对于部分剧目文本进行不断修缮。凡此种种,皆从文本文学角度对于京剧选本的发展完善作出了不懈努力。

其实,对于京剧文学性认知有限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还体现在文学传播方式的固有观念方面。“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文化、文学、艺术理论,多少都与文本、印刷文化形态脱离不了干系,某种程度上说是建立在文本、印刷文化基础之上的——以文本和印刷文化为主要探讨对象,以文本和印刷文化形态为主要呈现方式保存下来的。”(袁国兴 293)因此,数量丰硕的京剧选本的不断刊印与传播,恰恰从文本、印刷文化层面证明了京剧文学拥有文本中心的基本前提与文献保障。然而,学界之所以不断强调京剧表演或其表演文学,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对于京剧文本、印刷文化认识的不足与忽视。京剧选本的存在,证明了京剧文学除了在唱的、演的层面上具有表演文学的视听价值之外,同样在写的、读的层面上具有文本文学的阅读价值。清宫档案《清昇平署志略》等载,光绪时期宫廷演剧即需呈送慈禧、光绪二人“本子”,并且反复申令。与此同时,“清末京

剧的繁荣局面,带来社会的普遍认同,也蕴含着众多商业机遇。其中,剧本印刷编选就是一项颇为可观的商业活动,北京、上海等地都编印了许多所谓‘孤本秘籍’的唱词戏考,这也使京剧文学以另外一种方式拥有了读者群体”(颜全毅 486—487)。由此可见,京剧选本的出现与繁荣使得京剧文学具有文本中心的传播渠道与研究价值。

那么,拥有文本中心的京剧文学究竟有哪些要素可以构成其文学性呢?我们不妨先来梳理一下前辈学者的相关论述:

在五四运动时,一般人提倡西方剧,尤其如易卜生,说他能在每一本戏剧中提出一人生问题来。其实中国京剧正是人生问题剧,在每一剧中,总有一问题或不止一问题包涵着。如死生,忠奸,义利,恩怨等,这些都是极激动人的人生大问题,中国京剧正能着眼在此。即西方戏剧也未能如此深刻而刺激人。(钱穆 174)

就我看来,曲折动人的故事框架,惟妙惟肖的人物性格,较为强烈的情感呈现,这些就足够构成文学世界的基本空间。文学更为重要的,还是要表现出关于人性、人文精神和人生之终极关怀的更深层面。至于语言的雅俗浓淡、不同文学样式皆有其具体规范。元代的人们,谁曾把杂剧当成过文学来看,但这并不妨碍其在文学上的价值。(谢柏梁 7)

综合来看,中国京剧之中森罗万象的人生主题、构思精巧的戏剧结构、典型立体的角色形象、真挚热烈的情感表达,乃至朗朗上口的唱词、亦庄亦谐的念白,无一不是京剧文学的经典要素。具体分析,《琼林宴》中虽有鬼神救助仍然不可逆转的人生悲剧,《拾玉镯》隐性三小戏与显性二小戏的自由切换,结合戏中戏的套层叙事结构,<sup>④</sup>从《大劈棺》《桑园会》到《武家坡》《汾河湾》试妻母题的反复演变,从《伍子胥》《走麦城》到《李陵碑》《挑滑车》英雄末路的不断展现……凡此种种皆是中国文学之中关乎人生不同层面经典问题的

体裁变异书写,京剧与其他文体类别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的演进发展。

最后,我们再来谈谈如何研究京剧文本中心的文学性。首先,选篇文本比较分析。京剧选本作为某一历史阶段剧本文学的记录与集结,切实反映出由选辑标准理念、舞台发展传承、审美接受差异等因素带来的演变更新历时脉络。因此,横向时段切面与纵向历时发展可以成为同类选本比较分析的两种基本维度。同一剧目、不同时段、不同选本之间,入选方式、频率、内容的比较分析;同一剧目、同一时段、不同演员流派剧本的比较分析;不同时段、同类选本,选篇内容、选录标准的比较分析……总之,尽可能立体多维地依据不同视角、多重逻辑标准进行选篇文本的比较分析研究。其次,经典文本的个案研究。具体包括对于经典选本和经典剧目的个案研究两个方面。例如对于《梨园集成》《戏考》《京剧丛刊》《京剧汇编》等的关注,对于《四郎探母》《双冠诰》《铡美案》《玉堂春》等的探讨。再次,流派剧目选本的文学特征。不同流派对于剧目选本的选择与发展实为文学审美接受的差异表现,流派剧目选本的建立与发展也为流派间的融合与传承提供了文献来源。最后,经典戏剧结构、文学母题、角色形象等元素也是京剧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其进行整体归纳与类型分析,可以见出京剧文学对于经典文学元素的重复构建与全新抒写。当然,研究京剧文本中心的文学性还有其他方法,余不一一。

### 三

文学选本的生产过程,同时也是文学理论的批评过程。郭绍虞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指出,整理、选择、品第、批评诸环节既是文学选本的生产过程,也是文学理论的实践过程。<sup>⑤</sup>而就中国京剧选本来看,它的理论构建是以文本作为中心的。中国京剧选本通过序跋、凡例、述考、选篇内容与排序等外在文本形态,集中呈现出选本理论、京剧理论、选本经典化等三个层面的重要价值。

#### (一) 选本理论

中国京剧选本首先呈现出的理论特征是在“选”的方面:选什么、从哪选、如何选、为何选系

列问题是每种京剧选本都需直面的,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也就成为京剧选本理论的构建主题。具体来看,京剧选本的序跋与凡例、类型与排序、命名方式与主题意图就是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也即京剧选本理论的构建主体。

序跋与凡例一般用于记述选本产生的缘由与过程、编选体例与方法。中国京剧选本的序跋最早见于《梨园集成·自序》两篇,其后清末时期的京剧选本皆无序跋,直到民国初期《戏考》出现才能接续。京剧选本凡例的出现,则是晚至1920年代左右。《梨园集成·自序》两篇最为鲜明的理论特征是在对于戏曲选本之中雅俗未能共赏、南北音韵各异、简编之出无据三大问题的探讨方面,进而编者秉持“删除淫艳”“汇集大成”的主旨思想与辑录标准,表达其对于花部皮黄戏本强烈的文体拔高意识。这种思想意识其实是对清代后期“花雅之争”戏曲格局的积极回应,期待以《梨园集成》为代表的皮黄戏曲选本能够得到市场与读者的全面接受。《梨园集成·自序》两篇集中代表了早期京剧选本文体自重、期待读者的理论思维;而从《戏考》开始,京剧早已炽热,京剧选本的理论特征也从文体之辨转向教化人心的价值功能定位方面。以《戏画大观》《戏学指南》等为代表的选本凡例,也在配合阐述京剧选本价值功能的同时,逐渐强调自身与众不同的选编特点及其理论依据。

相较序跋与凡例的显性阐述,京剧选本的类型内容与排序方式则是隐性呈现理论批评的发展演变。一、中国京剧选本在戏曲文体方面呈现出从含混不分到明确辨体的演变轨迹。《梨园集成》收剧48种,但是编者并未区分皮黄与昆曲之文体差异,甚至学界相关研究基本误作昆曲2种、皮黄45种或46种,难以辨别《绿牡丹》一种的存本样态与昆曲属性。这种戏曲文体兼收混乱的现象显示的是早期京剧选本文体意识相互纠缠的理论弱点。1923年,《戏曲大全》12卷详细分列京剧、广东剧、昆剧、昆滩、鼓词、弹词、道情七大戏曲曲艺种类,京剧一类独占鳌头并又详细按照角色行当分作十类,显示出戏曲文体观念逐渐清晰的认知过程。此后,京剧选本更是鲜有并列其他同类戏曲文体的现象出现,京剧作为一种独立新兴的戏曲种类,选本的文体观念也呈现出从含混不清到分类明确再到文体独立的演变过程。二、中

国京剧选本的选篇排序方式代表着行当流派的发展轨迹与理论依据。清末以来,以《消闲录》等为代表的抄本系统采用行当分类的排序方式逐渐得到发展。《戏曲大全》分作十类,以老生为首的排序标准基本代表着中国京剧生、旦、净、丑的行当定位与随之而起的流派发展格局。与此同时,行当流派的严格区分与精准排序表现出中国京剧选本对于行当剧目的选择标准与品第态度,蕴含其中的是对京剧流派以及流派剧目的批评意识。三、中国京剧选本从剧选到段选到谱选的内容演变,呈现出选本形态方面重心不一、类型各异的综合特征,隐性揭示出市场需求与读者接受的审美差异。

选本理论最为鲜明的特征还有通过命名方式呈现出的主题意图演变。从“梨园集成”到“京调脚本”,从“戏考/指南”到“大全/大观”,从“传统剧目”到“革命现代”,从“丛刊汇编”到“经典选段”,命名方式的不同展现的是选本主题意图的变化,同时呈现出中国京剧选本自我认知的探索过程。从“梨园”到“京调”,从“京曲”到“京剧”,京剧命名从笼统称谓到精确明晰的发展脉络,既是京剧自我发展完善的蜕变轨迹,又是文体观念与文学接受的演进过程。选本命名方式的变化直观反映出不同历史阶段选本理论的区别特征,更为重要的是,显性的命名方式与隐性的主观意图皆是选本理论批评的具体体现。

## (二) 京剧理论

中国京剧选本之所以会有京剧理论与选本理论的明确区分,是因为从《戏考》开始,针对入选剧目的文献考述与理论批评成为一种新的范式。这种范式的建立与延续,不仅使之成为京剧选本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在读者接受美学视域之下对于京剧剧本与表演进行评介与指导,进而完成对于京剧理论的开拓、建构与发展。

一般而言,选目文本前的述考主要包括两个部分:针对剧目题材的考述简介与针对场上演出的舞台批评。试以《戏考》第十三册大错述考《黛玉葬花》为例:

林黛玉葬花,为《石头记》中大观园十二影事之一,即第二十七回埋香塚黛玉泣残红之一段。固已尽人皆知,亦无



待大错赘述。至编入戏剧,则曾闻樊樊山已先为兰芳梅郎编排之。梅郎于京师已曾串演,其扮演此剧之摄影,曾见诸本馆所出之游戏杂志中,洵歌场韵事也。惟其脚本则吾未之见。然传闻梅郎于此剧,练成之后,亦不常演。《红楼梦》剧之难编难演,即斯可想见矣。此脚本系予倩所编,复经冥飞、尘因为之润词。其唱白句语,悉从原书中剪裁而出,风雅细腻,洵于剧本中得未曾有。惟程度过高尚,戏情过幽深冷淡,恐终非今日戏世界中,具一般普通听戏之眼光者,所欢迎也欤!(王钝根 1)

这段考述文字,先从剧日本事入手;再来梳理梅兰芳、欧阳予倩二人脚本编撰经过,指出樊樊山、张冥飞、杨尘因等人对于京剧脚本文学润色的重要作用;最后针对舞台观演时况发表评论。综合其他选本来看,就其考述简介方面,不仅对题材源流、内容主旨进行考辨概述,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剧目思想微言大义、阐述蕴藉其中的人生哲理与教化观念。这种针对文本思想的探索发微,既是选本编者以读者身份接受审美的理论诠释,又是站在作者角度引领阅读的批评导论。就其舞台批评来看,则是兼具观众视角与导演意识二重身份,围绕舞台演出表达的审美品鉴。既有对于擅演名伶精湛技艺的赏鉴与评论,又有关注舞台演出的导演理论与审美要求。

综合而言,选本之中关于京剧理论的表达兼具作者、读者、导演、观众多重审美批评视角,融合清代以来考镜源流的学术传统与品花捧角的梨园风尚。这种批评理论或有失之模糊、浅显的弊端,但是贵在自然、真实。尤其许多关于京剧鼎盛阶段舞台演出的笔录与品鉴,较为完整地呈现出了时代名伶风采与观众审美风格。

### (三) 选本经典化

中国京剧选本的发展过程不仅是对剧目文献的整理与保存过程,而且还是反复选择、淘汰的文学经典化过程。从《梨园集成》开始,中国京剧选本的命名方式就已显露出一种集成求全的综合意识,并且这种意识更为明确地表现在1910年代至1950年代的“大观/大全”系列选本之中,尽管其中诸多选本离“全”甚远。然而1980年代以来,

京剧选本的命名开始不断强调“经典”。京剧成为经典国粹艺术,京剧选本自然就有经典文献。那么,中国京剧选本经典化的方式与过程、结果与影响则是需要重点关注的。

从“大全”到“经典”,是中国京剧选本取向意识的转变,也即选本经典化的发展历程。1950年代以前,“大观/大全”成为中国京剧选本的集中冠名,而从1950年代开始,“选集/选段”逐渐取而代之,并且开始强调“经典剧目/唱段”。这种选本命名方面的直观变化,反映的是文学观念之中对于选本观念认知的具体化与进化,认为京剧选本可以从“全”到“选”,也就承认京剧发展存在一种选择淘汰的过程,这种过程也即选本经典化。而在选本经典化过程之中,“选择”和“树立”则是两种重要的方式。先说选择,作为选本,选择是其最为重要的生成方式,但是选择并非限于选本编者,更多源自市场需求。在舞台演出市场最为叫座的剧目,自然成为选本市场读者期待视野中最为瞩目的焦点。票座越高,期待越高,入选频率随之提高,成为经典的可能性也就随之提高。那些久经舞台演出市场考验,不断得到传承发展的优秀剧目,自然成为经典剧目,甚至成为流派代表剧目。这种市场中心的选择过程符合京剧舞台剧目盛衰、审美需求发展的基本逻辑,也就成为选本经典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再说树立,这是“革命样板戏”走向经典的重要方式。“样板戏”的称名与定位本身就是将其作为京剧典型的模范“样板”,已然自具经典光环。而在1967年至1976年间,公开出版的京剧选本只能经由明确意识导向树立经典。当然,即便“样板戏”最初是以树立的方式成为经典,但在其后发展过程之中也要接受市场选择与审美检验,最终才能完成经典化之路。

京剧选本经典化之后,最为显著的结果就是重复,入选频率越高其实也就证明重复概率越大。这种重复既指京剧选本内容,也指舞台演出剧目。重复之后,中国京剧选本便有如下影响:一方面,经典剧目反复打磨,对于京剧文化的内向传承与外向传播皆有益助,如以收录“具有教学和演出价值”(中国戏曲学院 1)为主的《京剧选编》便有此特征。另一方面,经典化可能造成京剧趋雅远俗的审美倾向,这与《梨园集成》开始希冀的“雅俗共赏”理念背道而驰,也使京剧乃至整个花

部戏曲失去根植于俗文化系统中的艺术命脉而最终走向没落。这是更加需要我们高度警惕与不断反思的问题。

剧本与表演之于戏剧的关系犹如一体两翼,相辅相成。但对于享有国粹盛誉的京剧而言,表演研究远重于剧本研究的现象造成了研究格局的极度失衡。应该看到,中国戏曲选本是中国戏曲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京剧选本作为承载京剧剧目文献最为集中、最为丰厚的史料场域,是一个亟须得到重视和研究的课题。我们在从文本中心建设关于中国京剧选本的宏观研究格局之时,还应看到微观个案研究也是有待细化和深化的问题。中国京剧选本作为近代戏剧历史发展转型阶段的典型文本代表,其与众多演出史料文献互为表里,共同勾勒“花雅之争”以来戏剧文化生态格局的变动轨迹。与此同时,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历史的连续急剧变化,势必也对京剧选本产生深刻影响: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的不断转型使得中国京剧选本在编辑出版、文本阐释、经典传承、传播接受各个环节既有前后接续的核心脉络,又有不断自我突破的增长节点。当然,研究中国京剧选本不但能够补足现有京剧研究的缺陷,更为重要的是以史为鉴,反观当下京剧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戏曲发展生存的困境。百余年来,中国京剧选本记载着京剧剧目淘汰与创新、发展与传承的艰辛历程,可为当下戏曲领域的剧本创作与舞台演出提供丰富切实的经验。关注中国京剧选本的域外藏录与翻译传播现象,不仅有助于历史文献的回流与保护,更加有利于国家优秀文化“走出去”。

#### 注释[Notes]

① 关于现存可见最早京剧选本的刊本情况:赵景深认为1919年题名“苔溪灌花叟主”裱订整理的《醉白集》为“同治年间的木刻本”,因此《醉白集》是早于光绪六年(1880)刊刻的《梨园集成》的“最早的京剧总集”,参见赵景深:“最早的京剧总集《醉白集》”,《戏曲论丛》1(1986):303—304。其后,《中国戏曲志·上海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版社,1996年,第728页)等著亦有载录。我们以为,《醉白集》实际经由灌花叟主裱订整理之后,原貌已难全见,更兼其中所收戏本刊刻体例不一、版本信息难觅,因此将其称作“最早的京剧总集”显然不够合适。但是,我们仍应承认《醉白集》裱订收录的京剧戏本仍有文献史学价值。因此,我们仍将《梨园集成》作为现存可见

的京剧选本研究的起点。

② 傅谨《京剧历史文献汇编·壹·前言》(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与朱万曙《〈全清戏曲〉整理编纂的理念》(《文艺研究》7(2017):132—139)同时指出京剧剧本的重要性,但是限于体例原因,皆将京剧选本排除在外。

③ 参见李簾“纠正滥编滥印传统戏曲剧本的现象”,《戏剧报》7(1954):28。

④ 参见李东东“双红堂藏清末民初京调折子禁戏《拾玉镯》研究”,《民族艺术研究》5(2013):72—77。

⑤ 参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2页。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唱腔选集》。北京:音乐出版社,1964年。
-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eatre, ed. *A Collection of the Singing Styles of Modern Peking Opera in 1964*. Beijing: Music Publishing House, 1964. ]
- 北京市艺术研究所 上海艺术研究所《中国京剧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2000年。
- [Beijing Art Institute and Shanghai Art Institute. *History of Chinese Peking Opera*. Beijing: China Theatre Press, 1990-2000. ]
- 陈大悲《爱美的戏剧》。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
- [Chen, Dabe. *Amateur Drama*.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11. ]
- 中国戏曲学院《京剧选编·编辑凡例》。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
- [National Academy of Chinese Theatrical Arts. *General Rules of Selected Peking Opera*.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1990. ]
- 钱穆《中国文学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 [Qian, Mu. *On Chinese Literatur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
- 王钝根《戏考》。上海:中华图书馆,1918年。
- [Wang, Dungen. *Collection of Plays*. Shanghai: Chinese Library, 1918. ]
- 谢柏梁《序言》,《清代京剧文学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4—11。
- [Xie, Boliang. Preface. *History of Peking Opera Litera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By Yan Quanyi.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2005. 4-11. ]
- 徐凌霄《皮黄文学研究》。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5年。
- [Xu, Lingxiao. *A Study of Pihuang Literature*. Beijing: China

Theatre Press ,2015. ]

颜全毅《清代京剧文学史》。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5 年。

[Yan ,Quanyi. *History of Peking Opera Litera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2005. ]

袁国兴《非文本中心叙事——京剧的“述演”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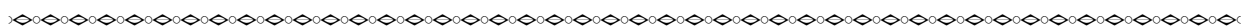
[Yuan ,Guoxing. *Non-Textual-Centered Narrative: A Study of Peking Opera's Narrative Performance*.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

朱崇志《中国古代戏曲选本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Zhu ,Chongzhi. *A Study of Selected Works of Ancient Chinese Drama*.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4. ]

(责任编辑:程华平)



· 书讯 ·

《文化研究：理论旅行与本土化实践》

作者：颜桂堤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12 月

本书详尽地勾勒了“文化研究”思潮在中国的理论之旅与本土化实践。“理论旅行”与“中国经验”是本书的理论焦点。从对“文化研究”的概念谱系考察出发，本书持续思索了文化研究在中国的理论旅行以及接合实践，关注文化研究如何影响并改造中国的知识生产与社会生活。在当代中国场域之中，文化研究的诸多理论资源与方法竞相争放、相互对话与博弈，它正朝着多元开放且具有阐释力和本土经验的方向发展。文化研究深刻参与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现实阐释与意义生产，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立场、中国经验。